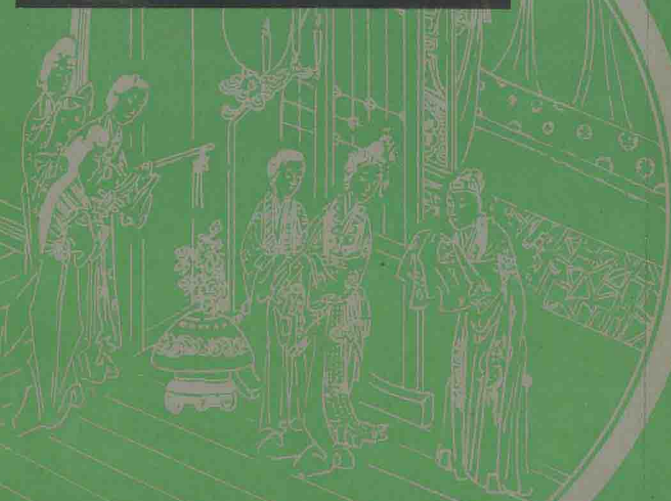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名剧系列

桃花扇

(清)孔尚任 著
迟崇起 校



孔尚任 评点

中国名剧系列

桃花扇

藏书

(清)孔尚任著
迟崇起校

中国名剧系列

桃花扇

(清)孔尚任 著
迟崇起 校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邢台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8.375印张 165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

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-10,000 定价:8.50元

ISBN 7-80611-276-6/I·266

前 言

在清代戏剧史上，向有“南洪北孔”之说。南洪，即浙江的洪升；北孔，即山东的孔尚任。洪升以《长生殿》饮誉剧坛；孔尚任则以《桃花扇》而名噪艺苑。

一、孔尚任生平及《桃花扇》的创作

孔尚任，字季重，又字聘之，号东塘，别号岸塘，自称云亭山人。生于顺治五年(1648)，卒于康熙五十年(1718)。

其人生经历，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，即未入仕途之前的学子生涯。孔尚任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大约在康熙六年(1667)前后，时当二十岁左右，即考中秀才。嗣后，乡试不中，于康熙十七年(1678)结庐曲阜城北石门山，隐居读书。康熙二十年(1681)，以捐纳为国子监生。其时，去明亡未远，故老尚多存者，有关南明史事多有所闻。诚如《桃花扇本末》所云：“族兄方训公，崇祯末为南部曹；予舅翁秦光仪其姻娅也。避乱依之，羁栖三载，得弘光遗事甚悉；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。”明朝故老谈及南明史事，亡国之痛的悲愤情绪给孔尚任心灵以强烈的震撼，遂决计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戏剧，以昭示世人，“惩创人心”。

不过,在此期间,《桃花扇》亦仅是草创阶段,这一点,他在《桃花扇本末》中说得十分清楚:“予未仕时,每拟作此传奇,恐闻见未广,有乖信史;寤歌之余,仅画其轮廓,实未饰其藻采也。”

第二个阶段,步入任途之坎坷经历。孔尚任步入仕途,完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冬,清圣祖玄烨南巡返京途中,路过曲阜,至孔子庙祭祀。孔尚任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世孙,学问又好,即蒙荐举,至“御前”解说《大学》,又做康熙帝向导,遍览孔庙、孔林各处文物古迹。凡康熙皇帝有所垂问,皆应对自如。孔尚任的出色表现,深得康熙帝赞赏。遂被破格录用。次年,入京为国子监博士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至淮扬治理黄河。历时近四年,至康熙二十九年(1689)冬,离开扬州,于曲阜小住,次年返京。在此期间,虽然由于吏治的腐败,终致治河无寸功可言,但是,却为他广泛接触社会,博采南明史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,在扬州,登临梅花岭,凭吊抗清名将史可法衣冠塚;与明代遗民冒襄、杜浚、黄云、许承钦、邓孝威等过从甚密,从他们那里听到诸多南明旧事佚闻。特别值得提到的是,孔尚任亦曾赴南明兴亡之地南京游览。在秦淮河,往昔歌楼舞馆的遗迹及李香君与侯方域的传奇故事,使他感触颇深。在断壁残垣的明故宫和凄凉的明孝陵,不禁徒然而兴亡国之遗恨。在南京,他还拜访了隐居在栖霞山白云庵的张瑶星。这位曾历任崇祯朝和弘光朝锦衣卫千户的道士,后来被他写进了《桃花扇》。扬州、南京的游历,极大地丰富了《桃花扇》的创作素材。

孔尚任返京之后,依然担任国子监博士之职。康熙三十四年(1695),迁户部主事。四年之后,即康熙三十八年(1699)六

月，惨淡经营十余年、三易其稿的《桃花扇》终于问世。

“《桃花扇》本成，王公荐绅，莫不借抄。时有纸贵之誉”，以至引起康熙帝的兴趣。孔尚任在《桃花扇本末》中云：“内侍索《桃花扇》本甚急；予之善本莫知流传何所，乃于张平州中丞家，觅得一本，午夜进直邸；遂入内府。”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正月，《桃花扇》始由“金斗班”上演，京城为之轰动。三月，孔尚任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。不料升官仅仅十几天的时间，却突然地被罢官了。罢官原因，至今仍是个疑案。他在《放歌赠刘雨峰》诗中说：“命薄忽遭文字憎，缄口金人受诽谤。”他的朋友刘中柱在《送岸堂》诗中说：“身当无奈何将隐，事在莫须有更悲。”这“莫须有”的罪名是什么呢？据袁世硕先生推测可能是“性耽诗酒……怠于政务”。袁先生又以为，这仅仅是个借口而已，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《桃花扇》的内容为皇帝所忌，“这部传奇虽然说不上有悖逆之嫌……但又毕竟易于启黍离之悲，事实上也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”（《中国著名文学家评传》）从《桃花扇》的剧场效果看：“笙歌靡丽之中，或有掩袂独坐者，则故遗老也；灯炮酒阑，唏嘘而散”（《桃花扇本末》）。能激发起如此沉痛的亡国之悲的剧本，焉得不为清廷所忌。而且，对抗清名将史可法热情讴歌，对叛将刘良佐辛辣嘲讽，甚至骂降清的徐青君（开国功臣徐达的后代）为“开国元勋”之“狗尾”。恐怕更难以以为清廷所容忍。

如果说，所有这些都可能引起清朝皇帝的忌讳，而最终以“莫须有”之罪令其解职归田，恐怕亦并非妄测之辞。

第三个阶段，即罢官归隐时期。孔尚任这一阶段的人生经历长达十余年。为维持清苦的生活，奔波劳顿之苦自不待言，而唯一给他精神上以慰藉的便是《桃花扇》的广泛社会影响：

《桃花扇本末》中有云：在京师滞留期间，“木庵先生招观《桃花扇》，一时翰部台垣，群公咸集；让予独居上座，命诸伶更番进觞，邀予品题。座客啧啧指顾。颇有凌云之气”。返归故里后，于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夏，北上正定府，拜访好友刘中柱知府。据作者自云：“时群僚高宴，留予观演《桃花扇》，凡两日，缠绵尽致。僚友知出于手也，争以杯酒为寿。予意有未惬者，呼其部头，即席指点焉”。

孔尚任一生，虽仕途坎坷，名位不显，且终至罢官，但他的呕心沥血之作《桃花扇》，却为他赢得了辉煌的荣誉。

孔尚任虽以传奇而名彪史册，其实，他的诗写得也不错，在当时名气颇大，有《湖海集》传世。他还是一位书画古玩收藏家，且著有《享金簿》一卷。今人汪蔚林辑有《孔尚任诗文集》。

二、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。

《桃花扇》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。遵循史实，是作者恪守的创作原则。诚如《桃花扇凡例》所云：“朝政得失，文人聚散，皆确考时地，全无假借，至于儿女钟情，宾客解嘲，虽稍有点染，亦非乌有子虚之比。”，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把历史剧写成教科书，历史剧是艺术创作。戏剧化的情节，哲理化的意蕴，是它应有的品质。毫无疑问，《桃花扇》即是具有这种品质的艺术精品。其成功的奥妙即在于：作者极为娴熟地运用了“借男女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这样一种艺术手法。

所谓“离合之情”，即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，侯方域与李香君之间的爱情，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时代色彩。时当晚明，复社与阉党余孽的斗争亦相当激烈，而且，这种斗争具有广泛的社会性。即如李香君这样一位风尘女子，亦厌恶阉党而倾向于复社。她之所以钟情于侯方域，不仅喜欢他的风流倜

悦，才华横溢，更敬重他复社人士的政治身份。既如此，她就不可避免地卷进阉党与复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，而两者之间的斗争又非同一般，它关系到南明王朝的盛衰兴亡。这样，她与侯方域的悲欢离合就必然地同南明兴亡纽结在一起。

男女之情与政治斗争交叉融合的开端，始于第七出《却奁》。阮大铖为了摆脱为复社人士讨伐的窘境，出资收买，试图收买侯方域。使其从中调合。结果碰了一鼻子灰，自讨没趣。侯、李既开罪于阮大铖，从此，也就埋下了祸根，生离之苦由此而引发。从情节结构的角度看，男女离合之情作为经线，南明兴亡史实作为纬线；两者由此而交叉绾合。

两条线索在交叉中，又不断引发出戏剧化情节。第十二出《辞院》，写由于政治斗争的形势变化，导致侯、李遭受生离之苦。东山再起的阮大铖诬陷侯方域勾结左良玉图谋不轨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，侯方域被迫逃离南京，一对恋人天各一方。就情节结构而言，经纬再度交叉。然而，纵贯全剧的离合之情这条经线由此而分作两个分支。

一个分支以李香君的不幸遭遇为核心内容，第十七出《抗媒》及第二十二出《守楼》，叙其反抗逼嫁；第二十四出《骂筵》及第二十五出《逃优》，写她被逼入宫，故事情节的发展，涉及阮大铖、马士英等权奸对李香君的迫害，以及弘光帝不思进取、纸醉金迷的无聊生活，从而表现了南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。另一分支以侯方域的行踪为核心内容。这一条线索，涉及十余出戏，牵动着史可法、江北四镇以及驻武昌的左良玉。而这些重要人物及引发的事件，都必不可避免地与南朝小朝廷的命运紧密相关。第十四出《阻奸》至第十六出《设朝》，主要写围绕着“迎立”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斗争。史可法采纳侯方域的

意见,反对迎立福王。而马士英、阮大铖却撇开史可法,拥立福王为帝,朝廷大权因此而落入权奸之手,而史可法却受到排挤。权奸当政,南明焉能不亡。第十八出《争位》,第十九出《和战》,第二十出《移防》及第二十六出《赚将》,写江北四镇争夺地盘,相互残杀;史可法为化解矛盾,调高杰移镇睢州,并委派侯方域做监军随高杰前往,又叙高杰不听侯方域忠告,被许定国赚杀,睢州防线随之瓦解。第二十九出《逮社》,第三十一出《草檄》及第三十二出《截矶》,写阮大铖拘捕侯方域等复社人士;左良玉为解救侯方域等人,起兵东下,直取南京;马士英、阮大铖急调黄得功等截杀左良玉,致使江北淮扬千里空营,给清兵以可乘之机。镇守扬州的史可法遂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。他的最终失败已不可避免。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,基本上都是以侯方域的行踪这一条线索串连起来。

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别,使“离合之情”这条纵向经线分作两个相互穿插的分支。两个分支各自勾连诸多政治事件,从而,在更广阔背景下,表现南明王朝的覆灭历程。

至第四十出《入道》,写侯方域与李香君相逢于道观,两个分支情节线索合而为一。然而,此时已江山易主,国破家亡。侯、李二人经道士点化,如梦初醒,割断情缘,双双入道。男女之情亦随着南明王朝覆亡而归于破灭,情缘悲剧与政治悲剧终于交汇融合。

三、善于刻划人物性格的复杂性

《桃花扇》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。李香君、侯方域、史可法、杨龙友、柳敬亭、苏昆生以及阮大铖、马士英,都是各具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,为戏剧百花园增添了耀人眼目的光彩。作者刻划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是多方面的,譬如:白描、

夸张以及同中见异等等。然而,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善于刻划人物性格的复杂性,使人物形象呈现出多侧面的性格特征。李香君个性刚烈,爱憎分明,敢作敢为,然而,她亦有柔情似水的另一个侧面。复社名士侯方域,随和厚道,率直洒脱。虽然,杨龙友险些使他陷入“依附奸邪”的困境,但他并没有因此对其心存芥蒂。后来,还是欣然同意杨龙友的请托,代父修札,阻止左良玉就粮南京的举动。而且,此人亦颇具政治头脑。江北四镇纷争之前,他即有预感,且分析得头头是道,大为史可法敬服,马士英欲立福王为帝,他力劝史可法全力阻止,并历数福王“三椿大罪”以及“五不可立”之理由,亦为史可法采纳。可是,他毕竟不是成熟的政治家,作为高杰的监军,在关键时刻,却没有尽到责任。高杰逞一时之勇,不识许定国奸计,又不听从他的劝阻,执意赴许定国营寨。在此情况下,他理应留在军中,作出应急对策,恰恰相反,他却视军国大事为儿戏,冷冷说道:“元帅既有高见,小生何用多言!就此辞归,竟在乡园中打听元帅喜信吧。”说罢,竟自赌气还乡去矣!这种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与他洒脱的性格不无关系,只是洒脱得稍有过头,变而为放荡不羁,任性轻率而已。

阮大铖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,然而,作者并没有把他简单化,概念化,既突出他险恶狠毒的本质特征,也表现他处困境之际的矛盾心理,对往昔追随阉党,亦曾有反思,有悔悟,并试图得到复社人士的谅解和宽恕。

而最具复杂性格之人物,则莫过于杨龙友此公,以至于学术界对这一人物颇多争议,某些论者以为,作者虽然不露声色,实则把杨龙友写成一个阴险狡猾的反派人物。其实,这是对作者本意的严重曲解。在作者笔下,杨龙友是一个有缺点的

好人。在政治上，他依附于马士英，又与阮大铖私交甚厚。可是，又一向对侯生、香君怀有好感。因此，他的活动，大多是往来于马阮与侯生、香君这相互对立的两者之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表现出他八面玲珑、生性软弱的性格特征。

为了讨好马士英、阮大铖，不免做了些伤害侯生、香君的事，可是，有些事，在他看来，并未觉得是坏事。譬如，他亲自携带“妆奁”赴媚香楼，意欲结交侯生，并通过侯生调合复社人士与阮大铖的矛盾，以使阮大铖摆脱困境，此举可使侯生有“依附权奸”之嫌，可杨龙友并未意识到这一点，他觉得平息“党争”，本是一番好意。因此，当他被拒绝时，尚且感到有几分委屈，故云：“正是多情反被无情恼，乘兴而来兴尽还。”

然而，有些事对侯生、香君显然有所伤害。如强迫香君嫁给田仰的举动，显然是有意为之。但作者写杨龙友此举，亦掌握了分寸，有意识地表现了他与阮大铖之流的本质差异。即在赴媚香楼之前，阮大铖恶狠狠地吼道：“竟去拉下楼来，打发起身便了！”而杨龙友却说：“也不可太难为她”？惹得阮大铖大为恼火，怒气冲冲地大声喝斥：“这还便宜了她，想起前番，就处死这奴才，难泄我恨！”两个人的对话，不是极分明地表现出各自的人格本质吗？

既去媚香楼，对处于危困境地的李香君，不仅没有太为难她，而且，施以“以李代桃”之计使之免于蹂躏之苦。

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他保护了香君，亦曾保护过侯生。当阮大铖诬陷侯方域谋反，欲置之死地的关键时刻，杨龙友没有保持沉默，而是当场为之辩白；辩白无效，即匆忙去通风报信，力促侯生远走避祸。

在这一系列的行为描写中，既表现了杨龙友八面玲珑，生

桃花扇序

尝怪百子山樵所作传奇四种，其人率皆更名易姓，不欲以真面目示人。而《春灯谜》一剧，尤致意于一错二错，至十错而未已。盖心有所歉，词辄因之。乃知此公未尝不知其生平之谬误，而欲改头易面以示悔过；然而清流诸君子，持之过急，绝之过严，使之流芳路塞，遗臭心甘。城门所殃，洊至荆棘铜驼而不顾。祸虽不始於夷门，夷门亦有不得谢其责者。呜呼！气节伸而东汉亡，理学炽而南宋灭；胜国晚年，虽妇人女子，亦知向往东林，究於天下事奚补也。当其时，伟人欲扶世祚，而权不在己；宵人能覆鼎饔，而溺于宴安；扼腕时艰者，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，时露热血者，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。斯乾坤何等时耶？既无龙门、昌黎之文，以淋漓而发挥之；又无太白、少陵之诗，以长歌而痛哭之。何意六十载后，云亭山人以承平圣裔京国闲曹，忽然兴会所至，撰出《桃花扇》一书。上不悖于清议之是非，下可以供儿女之笑噱。吁！异乎哉！当日皖城自命以填词擅

天下，诂意今人即以其技，还夺其席，而且不能匿其瑕，而且几欲褫其魄哉！虽然，作者上下千古，非不鉴于当日之局，而欲哺东林之余糟也；亦非有甚慨于青盖黄旗之事，而为狡童黍离之悲也。徒以署冷官闲，窗明几净，胸有勃勃欲发之文章，而偶然借奇立传云尔。斯时也，适然而有却奁之义姬，适然而有掉舌之二客，适然而事在兴亡之际，皆所谓奇可以传者也。彼既奔赴于腕下，吾亦发抒其胸中，可以当长歌，可以代痛哭，可以吊零香断粉，可以悲华屋山邱，虽人其人而事其事，若一无所避忌者，然不必目为词史也。犹记岁在甲戌，先生指署斋所悬唐朝乐器小忽雷，令余谱之。一时刻烛分笺，迭鼓竞吹，觉浩浩落落，如午夜之联诗，而性情加畅。翌日而歌儿持板待韵，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帜矣。斯剧之作，亦犹是焉。为有所谓乎？无所谓乎？然读至卒章，见板桥残照、杨柳弯腰之语，虽使柳七复生，犹将下拜。而谓千古以上，千古以下，有不拍案叫绝，慷慨起舞者哉？妙矣，至矣！蔑以加矣！若夫夷门复出应试，似未足当高蹈之目，而桃叶却聘一事，仅见之与中丞一书；事有不必尽实录者。作者虽有轩輊之文，余则仍视为太虚浮云，空中楼阁云尔。

梁溪梦鹤居士撰

桃花扇小引

传奇虽小道，凡诗赋、词曲、四六、小说家，无体不备。至于摹写须眉，点染景物，乃兼画苑矣。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，而义则春秋，用笔行文，又左、国、太史公也。于以警世易俗，赞圣道而辅王化，最近且切。今之乐，犹古之乐，岂不信哉？《桃花扇》一剧，皆南朝新事，父老犹有存者。场上歌舞，局外指点，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于何人？败于何事？消于何年？歇於何地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，亦可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之一救矣。盖予未仕时，山居多暇，博采遗闻，入之声律，一句一字，抉心呕成。今携游长安，借读者虽多，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，每抚胸浩叹，几欲付之一火。转思天下大矣，后世远矣，特识焦桐者，岂无中郎乎？予姑俟之。

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笔。

桃花扇小识

传奇者，传其事之奇焉者也，事不奇则不传。桃花扇何奇乎？妓女之扇也，荡子之题也，游客之画也，皆事之鄙焉者也；为悦己容，甘髻面以誓志，亦事之细焉者也；伊其相谑，借血点而染花，亦事之轻焉者也；私物表情，密缄寄信，又事之猥褻而不足道者也。桃花扇何奇乎？其不奇而奇者，扇面之桃花也；桃花者，美人之血痕也；血痕者，守贞待字，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；权奸者，魏阉之余孽也；余孽者，进声色，罗货利，结党复仇，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。帝基不存，权奸安在？惟美人之血痕，扇面之桃花，啧啧在口，历历在目，此则事之不奇而奇，不必传而可传者也。人面耶？桃花耶？虽历千百春，艳红相映，问种桃之道士，且不知归何处矣。

康熙戊子三月云亭山人漫书

桃花扇本末

族兄方训公，崇祯末为南部曹；予舅翁秦光仪先生，其姻娅也。避乱依之，羁栖三载，得弘光遗事甚悉；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。证以诸家稗记，无弗同者，盖实录也。独香姬面血溅扇，杨龙友以画笔点之，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。虽不见诸别籍，其事则新奇可传，《桃花扇》一剧感此而作也。南朝兴亡，遂系之桃花扇底。

予未仕时，每拟作此传奇，恐闻见未广，有乖信史；寤歌之余，仅画其轮廓，实未饰其藻采也。然独好夸于密友曰：“吾有《桃花扇》传奇，尚秘之枕中。”及索米长安，与僚辈饮宴，亦往往及之。又十余年，兴已阑矣。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，每见必握手索览。予不得已，乃挑灯填词，以塞其求；凡三易稿而书成，盖己卯之六月也。

前有《小忽雷》传奇一种，皆顾子天石代予填词。予虽稍谙宫调，恐不谐于歌者之口，及作《桃花扇》时，天石已出都矣。适

吴人王寿熙者，丁继之友也；赴红兰主人招，留滞京邸。朝夕过从，示予以曲本套数，时优熟解者，遂依谱填之。每一曲成，必按节而歌，稍有拗字，即为改制，故通本无聱牙之病。

《桃花扇》本成，王公荐绅，莫不借钞，时有纸贵之誉。己卯秋夕，内侍索《桃花扇》本甚急；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，乃于张平州中丞家，觅得一本，午夜进之直邸，遂入内府。

己卯除夜，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，即索《桃花扇》为围炉下酒之物。开岁灯节，已买优扮演矣。其班名“金斗”，出之李相国湘北先生宅，名噪时流，唱《题画》一折，尤得神解也。

庚辰四月，予已解组，木庵先生招观《桃花扇》。一时翰部台垣，群公咸集；让予独居上座，命诸伶更番进觞，邀予品题。座客啧啧指顾，颇有凌云之气。

长安之演《桃花扇》者，岁无虚日，独寄园一席，最为繁盛。名公巨卿，墨客骚人，骈集者座不容膝。张施则锦天绣地，牖列则珠海珍山。选优两部，秀者以充正色，蠢者以供杂脚。凡砌抹诸物，莫不应手裕如。优人感其厚赐，亦极力描写，声情俱妙。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文孙，诗酒风流，今时王谢也。故不惜物力，为此豪举。然笙歌靡丽之中，或有掩袂独坐者，则故臣遗老也；灯炮酒阑，唏嘘而散。

楚地之容美，在万山中，阻绝人境，即古桃源也。其洞主田舜年，颇嗜诗书。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，竟入洞访之，盘桓数月，甚被崇礼。每宴必命家姬奏《桃花扇》，亦复旖旎可赏，盖不知何人传入。或有鸡林之贾耶？

岁丙戌，予驱车恒山，遇旧寅长刘雨峰，为郡太守。时群僚高宴，留予观演《桃花扇》；凡两日，缠绵尽致。僚友知出予手也，争以杯酒为寿。予意有未惬者，呼其部头，即席指点焉。